考古学的多副面孔

王益人

考古学是一个学科，更是一个命题。什么命题？不同视角、不同研究方向，给出不同的命题。但总的来说，考古学是一个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逐步走向文明进步的命题；是一个用语言文字形式阐释“物质存在”，阐释人类发展规律及其社会关系的命题。传统观点认为考古学属于历史学范畴，是“证经补史”为历史学做佐证、为历史学服务的。仔细想想为什么一定属于历史学呢？历史学又属于谁？一座墓葬或一艘沉船，对于蚂蚁或小鱼而言，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空间存在而已。然而对于人类而言，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也只有人类才会对它们有兴趣——对自身的历史感兴趣。虽然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问，但我们知道，在鱼的世界里没有考古学。因此，考古学是关于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发展进步的学科，除了历史学意义之外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内容。1962 年，宾福德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中，系统阐述了考古学在“阐释整个时空内的人类生存之物质及文化”的层面应有更加广泛的作用，开启了一场“考古学革命”，逐渐将考古学引向科学的范畴。

其实，考古学就是考古学。它是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细节，探索人类起源，研究人类生存方式以及对自然环境适应能力，乃至不同历史阶段人类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艺术成就等一系列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因此，它具有历史性、社会性、科学性、艺术性、文化性等，包括对人类文化多方面成就的阐释。因此，它具有多副面孔。

考古学不仅仅属于历史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部读不完的“百科全书”，历史记录的仅仅占其中很少一部分。考古学诞生以来，为我们认识人类自身历史和社会变迁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然而，考古学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完善“历史编年”、印证曾经久远的辉煌历史那么单纯；其根本目的在于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研究古代社会历史；通过历史遗迹、文化遗物，展现不同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成就，反映其人文历史、社会价值及其缘由的方方面面。

考古学以探索发现为第一要义，根据古代物质遗存挖掘湮灭已久的人类历史片段，创造新知。这一特点一方面决定了考古学对人类历史文化演进的不可或缺，例如人类起源演化、农业起源、文明起源、文字的产生、国家和社会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乃至意识形态等重大历史问题。另一方面，考古学又是展示人类社会物质文化成就、科学技术发展进步阶梯等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窗口。

从古典考古学到科学考古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不再单纯。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已经融入到人类发展的思想体系中去，渗透着许多哲学思想的碰撞与交流。正如布鲁斯·G·特里格所说的那样：考古学活动不可置疑地改变了对人类历史和行为的理解。

当代考古学是建立在古物学和地质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学科。十九世纪以来兴起的史前考古学在探索人类起源演化和文明进程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极大地延伸了历史的轴线，拓展了历史的宽度，丰富了我们对人类发展演进历程和历史文化的认知。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将人类历史向前延伸了 300 多万年；农业考古学、聚落考古学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将人类的定居生活和农业萌芽推进到 2 万~1.5 万年前。

二百多年的考古学发掘研究，积攒了人类从狩猎采集的蒙昧野蛮时代逐渐向原始氏族社会过渡，进而向文明时代进发的巨量考古学资料，催生了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农业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宗教考古学、社会考古学等门类的知识体系。它们中的大部分仍然在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的框架之下，利用田野考古的材料研究古代社会的某一个方面，只不过研究的侧重点和主体目标有所不同。

人类属于社会性动物，她不仅创造了历史，还创造和改变了自己、创造了社会。因此，考古学除了在历史进程这条主线之外，还涉及人类生存、环境适应、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社会细胞的细枝末节。吃什么——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用什么——器物类型学；住哪里——聚落考古，怎么住——建筑考古学；如何制作工具——石器打制技术、实验考古学；如何适应环境——环境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如何看待自然——天文历法、天文考古学；如何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火的使用、农业考古学、冶金考古学、科技考古学；有何信仰——民族考古学、宗教考古学；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取得了什么样的文化艺术成就——文化考古学、音乐考古学、美术考古学；乃至人群组织架构的形成与发展及社会体系的建立——社会考古学；人类认知能力和语言的起源——认知考古学。可以说考古学从理论体系到具体实践，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其触角已经深入到整个人类世界的方方面面。

考古学不是挖宝

考古学不在于“挖宝”，不能仅限于展现精美、绝世的古代文物，而在于探究这些文物背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根脉、社会机理和运作体系等一系列问题。考古学不仅仅在于验证历史、“再现”历史片段，发现众多历史上没有记载的东西，更在于探寻其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

考古学有绚丽多彩、璀璨夺目的一面，也有灰头土脸、稀松平常的一面。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被看好的后者。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他们的一生基本上是与破破烂烂的石头瓦块打交道——从中搜寻着古代人类发展进步的足迹——发掘和整理出能够让公众理解和认识的知识。这正是考古学家的职责和追求所在。一百多年间，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到大江南北，数以千计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将东亚大陆的人类历史提前到 243 万年以前；仰韶遗址发现以来数以万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研究，揭示了从部落联盟到古国时代再到王朝国家的演进历程；大量先秦遗存以及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映射了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成就。

考古学关注个例，但不限于个例的体现，更在于其中蕴含的集体意识和社会意识。无论是令人费解的三星堆、雄浑壮美的秦兵马俑；还是曾侯乙墓、中山王墓、海昏侯墓……无数震撼世界的考古发现，其意义不在于文物本身精美的外表，而在于内在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对我们知识体系的扩充。

裴里岗、贾湖、二里头、仰韶、龙山、良渚、陶寺、石峁、三星堆的发现，展现了“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中华史前文明。贾湖遗址发现的大量包括猪、狗、牛、鹿、鹤、龟、鳖、螺、蚌和扬子鳄动物骨骼，大量水稻植硅石和炭化稻米，以及世界上最早的七声音阶骨笛、甲骨契刻符号、绿松石饰品等文物，显示了较为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指引我们追寻 9000 年前中华文明的足迹。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遗址，历经 40 多年的发掘研究，揭露出包括宫城、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王陵区、礼制建筑区（观象台）、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区域的具备国家形态的都邑性王城遗址；出土了彩绘龙盘、朱书文字、铜铃、土鼓、鼍鼓、特磬、玉器、漆木器、圭尺等重要文物，标志着中华民族王权和礼制“最早中国”诞生，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记载了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农业、仓库、货币、贸易、徭役、置吏、军爵、手工业等十多项内容，为研究秦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医学等方面提供了实证资料。回天医简发现了迄今为止数量最丰富、体系最完整、最具理论和临床价值的古代医学文献。

所有这些，组成了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的集体记忆和基因密码。

考古学不仅仅在地下

考古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与过去的人类生活及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其中有的是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研究人类社会演进。考古发掘获得的器物是物质的，指示了文明进程中跨越的一座座山峰。博物馆中精美的文物在给人带来震撼、美感和艺术享受的同时，更能让人们领悟其精神内核。

考古学方法是一个很好的思维训练的方法，建构起以时间演化为轴线，以空间分布为格局的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哲学思考。

究其本质而言，考古学的产品是精神层面的，而不是物质层面的。考古学是生产精神财富的，抑或说是将物质遗存转化成社会认知（文化遗产）的一门科学——是通过发掘物质遗存（包括历史典籍）来“生产”精神产品。因此，考古学不应是少数人书斋里的象牙塔，不再是收藏家们的精神追求。

我们说考古学不仅仅在地下。

地上文物的考古学研究，历史文献的考古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和广阔前景。敦煌石窟、云冈石窟、永乐宫壁画、应县木塔以及遍布全国的地上文物蕴含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成为建筑考古学、佛教考古学、道教考古学、艺术考古学、社会考古学重要基石。而知识考古学、认知考古学、宇宙考古学、未来考古学等新型软性考古学分支，亦将考古学研究上升到哲学层面和更加广阔的领域。

考古学不但追溯历史阐释过去，还关注未来启迪人类。考古学为探索历史真相和人类的过去服务，更是为人类的命运服务。这是考古学的终极命题。中国本土历史多元一体、政治体制连绵不绝、哲学思想独树一帜。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不但成为天文考古学、医药考古学、科技考古学、社会考古学的天然沃土，而且在文明进程、国家形成、民族融合、经济贸易等方面具有非凡的意义。考古学在发现与思辨、阐释与反思层面所特有的功能与潜质，作用是巨大的。从历史文献中寻找“瘟疫与战争”“文明与对抗”“合作共赢”先例，反思给人类带来的益损，从而为人类的未来带来希望与光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寻迹崧泽文化的窑

何文竞 邵栋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类文化遗存，目前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也多以不同考古学文化陶器的差异作为主要的区分指标。陶器的生产一般离不开窑（无窑露天烧除外），由于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原材料易得、运输成本的限制等多方面原因，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绝大多数应该都是在其使用地范围内或附近烧造的。因此，窑也是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为常见的遗迹类型之一。如在黄河流域就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仰韶至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窑；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先秦窑址超过一百处，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有近七十处等。

难觅踪影的崧泽窑

在长江下游地区发现了成百上千个崧泽文化时期遗址，包括房址、墓葬、灰坑、水井等各类遗迹单位。遗址中出土的陶器、陶片数量也非常巨大，但有个现象比较“奇怪”——为什么确信无疑的崧泽窑址却难得一见？

笔者长期在长江下游地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参与发掘过十几处崧泽至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和墓地。对崧泽文化陶器最深的感触是这些陶器、陶片在清理时基本都不能水洗，浸水后器表的陶衣和陶片的“茬口”便会消失，会对文物造成伤害，也影响进一步的修复和文保工作，更不用说用毛刷刷洗了。后来，笔者又在山西发掘了一个季度的仰韶至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遗址，出土的彩陶片、红陶片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们在质地上更接近于南方地区的硬陶，没有彩绘的陶片用毛刷清洗不会对其造成伤害。笔者一度认为主要是因为南方地区地下水位高、雨水多，水的长期浸泡，使得史前陶片质地变得松软，但同时我们也发现稍晚的印纹硬陶就不受影响，所以就更倾向于认为烧造陶器的原料和烧造温度应该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窑所能达到的烧造温度与窑的结构直接相关，因此我们进一步怀疑是否史前时期东南地区窑的结构与中原、长江中游一带的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崧泽窑难觅踪迹？

建筑材料还是废物利用

不少学者将红烧土与房址联系起来，认为红烧土大多属于建筑材料，并以偶尔一见的红烧土残存墙体作为证据，加之以一些红烧土块上的木质、草灰痕迹，进一步认为经烧烤的木骨泥墙类建筑物在新石器时代广泛存在。

笔者觉得红烧土建筑在史前时期肯定是确实存在的，但到底是偶然一见还是普遍现象当可商榷，因为史前的房址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数量也很多，但是可以确认的红烧土建筑物却较为罕见，所占比例很低。相当数量的房址只是在柱洞或墙基中发现一些细碎的红烧土颗粒和红烧土块，这种现象更像是废物再利用，而不是说红烧土一开始烧制的时候就是作为建筑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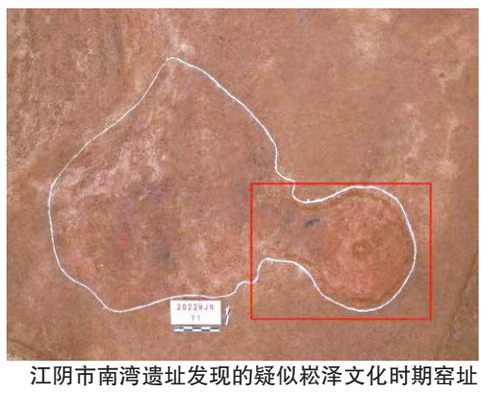
我们认为东南地区史前时代大多数的红烧土可能是烧陶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用一次性薄壳窑烧造陶器时，会在陶坯四周堆放柴木和干草等燃料，外围还要用湿黏土密封，因此，一次性薄壳窑的“壳”上也会因为接触到柴草留下印痕，出现这些痕迹的红烧土也有可能是窑底或窑“壳”的废弃物。

一些与崧泽窑相关的考古发现

长江下游地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及临近地区（如凌家滩文化）新石器时代比较明确的窑址非常罕见，这应该与其建造的环境与窑本身的结构不易保存有关。虽然完整的窑址尚未被发现，但在一些考古工作中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崧泽文化时期陶器烧造可能多用无窑露天堆烧法或者一次性平地（浅穴）薄壳窑，试举以下两例。

20 世纪 60 年代，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发现过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圆形，面积为 1~5 平方米左右的红烧土面，烧土夹杂芦苇、稻草茎叶痕迹，发掘者推测是平地烧窑的窑场，罗超进一步认为应当就是一次性薄壳窑。

2023 年，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江阴市南湾遗址发现了一座疑似崧泽时期的窑址，其平面为近葫芦形，呈东西走向，长约 1.8、宽约 1.6、残深约 0.2、壁厚 0.03~0.05 米，底部存在红烧土硬结面（发掘者认为该窑为图中白灰线所包括的范围，由操作间、火膛、窑室组成，笔者认为红线内为窑室，所谓“操作间”和“火膛”的边界不明显，可能为误判）。从其外形来看，非常有可能是一座一次性薄壳窑。



江阴市南湾遗址发现的疑似崧泽文化时期窑址

几点其他看法

关于一些史前整体的红烧土房址，我们认为木骨经过火烤时，火候掌握不好的话有机质会炭化，起不到加固的作用，反而会降低墙体的强度。有可能存在两段式的墙体，即下部用火烤，墙体立面中留有空洞，烧烤完成后在空洞中立柱，上层仍用普通黏土建造。关中地区现在仍有这类房体下部为砖、上部用土坯的房子，可以起到比较好地防止雨水侵蚀墙基的作用。

一些地区考古发现的整体式的红烧土墙，不可否认是当时等级较高的建筑物遗存，但其普及程度还不明确，并且在笔者的想象中，这种房子在烧造的时候多半会在房子里堆满陶坯，房子“装修”好了，一窑陶器也烧制完成了，一举两得。

中国的青铜器之所以最先出现于北方和中原地区，可能也与该地先民掌握了先进的烧窑技术可以达到更高的温度有关，东南地区史前的陶器烧造技术一直比较落后——东南地区史前可能一直采用的是无窑露天堆烧法或者一次性平地（浅穴）薄壳窑，这种情况一直要延续到硬陶和原始瓷的产生，南方地区才迎头赶上，甚至在后来一度超越了北方和中原地区。

（作者单位：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从辽金元祭祀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陈佳莉 史浩成

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这五大特性相互交织、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辽金元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三个王朝的国家祭祀活动，不仅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悠久传统，更融入了独特的民族元素和时代印记，鲜明地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文化格局。本文以辽金元国家祭祀考古发现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其所体现的中华文明五大特性，以期揭示其深远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

连续性：在传承中绵延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持续传承，得益于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国家祭祀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辽金元时期的国家祭祀考古发现，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文明在传承中持续发展的显著特征。辽庆陵遗址的三座帝陵前的享殿，其平面布局和建筑形态与唐宋帝陵的享殿相似，均采用了前朝后寝的格局，这明确地揭示了辽代帝陵祭祀制度在陵园布局、建筑形态等方面对中原王朝传统的继承。此外，辽代亦继承了中原王朝祭祀天地的传统，并将其与契丹民族自身的自然崇拜相结合，内蒙古巴林右旗罕山辽代祭祀遗址群出土的祭坛、祭祀坑等遗迹以及大量的祭祀用品，证实了辽代祭祀山川的仪式。金代国家祭祀同样展现了对中原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北京房山金代皇陵建筑遗址群的布局规制，体现了对中原王朝陵寝规制和建筑风格的借鉴与吸收。此外，黑龙江阿城刘秀屯建筑遗址被认为是金代祭祀日神的“朝日殿”，表明金代亦继承了中原王朝祭祀天地的传统。元代国家祭祀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多元化的祭祀体系。辽金元时期的国家祭祀制度，在继承中原王朝传统的同时，也融入了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国家祭祀制度上的连续性与创新性。

创新性：在融合中发展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持续展现出创新的活力，源于其开放与包容的特质。在保持其独特性的同时，该文明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辽金元时期的国家祭祀活动，在继承中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时代精神，彰显了中华文明在融合中发展的卓越特性。辽代的国家祭祀体系，展现了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契丹的自然崇拜和萨满信仰与中原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丰富的祭祀对象，包括天地、祖先、山川、日月星辰等。罕山祭祀遗址体现了契丹对山川的祭祀，而柴册仪遗址则展示了仪式的创新：契丹传统的燔柴告天仪式与中原皇帝受册仪式相结合，祭坛采用了方形与圆形相结合的独特设计，象征着斯基泰与汉式文化的融合。金代国家祭祀展现了女真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创新精神。他们将长白山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形成了独特的长白山祭祀文化。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这一创新之举。其建筑布局、祭祀遗物等，都体现了女真族对神山的崇敬。元代国家祭祀融合了蒙古草原文化和萨满信仰，祭祀敖包、祭天等仪式，形成了更为多元的祭祀体系。辽金元三朝的国家祭祀制度，在继承中原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形成了多元创新的祭祀体系，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推陈出新的强大生命力。

统一性：在交融中形成

中华文明乃众多民族共同缔造之成果，辽金元国家祭祀体系恰为该特性之生动体现。此等王朝作为多民族共融之政权，其统治者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积极采纳并融合各民族信仰，终铸就统一之国家祭祀体系，彰显了中华文明“于交融中形成”之显著特质。多民族文化交融之特征，在辽代帝陵及贵族墓葬之祭祀遗址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辽代帝陵及贵族墓葬之祭祀遗址，皆可见多民族文化交融之痕迹。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怀陵遗址出土之文物，融合了契丹、汉族等多种文化元素，既有汉式建筑风格之享殿，亦有契丹传统之祭祀用品。金代国家祭祀体系，在吸纳汉族礼仪制度之同时，亦融入了女真族自身之传统习俗，形成了独特之国家祭祀体系。元代正蓝旗羊群庙祭祀遗址亦展现了文化交融之景象。石雕像服饰上之变形缠枝花卉图案与江南地区元代瓷器图案风格相一致，卷云龙纹图案亦见于其他地区元代器物，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之特征。此等考古发现表明，辽金元国家祭祀非单一民族文化的体现，而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之产物，反映了统治者通过国家祭祀活动，将不同民族之信仰和文化融入国家祭祀体系中，增强了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

包容性：在碰撞中互鉴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始终贯穿着与世界各地文明的深入交流与互相学习。辽金元国家祭祀考古的发现，揭示了这些北方王朝独特的祭祀体系，体现了中华文明“在碰撞中互鉴”的开放姿态和兼容并蓄的特点。佛教的影响在辽金时期尤为显著，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中的琉璃寺遗址，其布局和建筑风格体现了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出土的大量琉璃构件和佛教造像，亦说明佛教已经融入金代国家祭祀活动。元代国家祭祀同样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出土的三尊汉白玉石人雕像，融合了汉族和蒙古族的文化元素——身穿绣龙袍服，脚蹬蒙古靴，腰带上系有蒙古刀、打火石等饰物，体现了元代国家祭祀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吸收和尊重，以及统治者对国家统一和文化认同的重视。辽金元时期国家祭祀对不同文化元素的吸收融合，体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也展现了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碰撞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

和平性：在共存中延续

中华文明深植“和而不同”的理念，追求和平，这一理念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辽金元时期的国家祭祀制度深刻地体现了对和平和谐共处的追求，展现了中华文明“在共存中延续”的和平基因。辽怀陵 M1 祭殿址出土的莲花纹柱础、花纹方砖以及陀罗尼经幢和石造像残块，不仅体现了辽代对佛教及汉文化的尊重，也对促进民族间的和谐与文化交融起到了积极作用，反映了统治者希望通过祭祀活动来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愿望。金代同样注重通过祭祀活动来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元代继承并发扬了这一和平理念，元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减少文化冲突至关重要。羊群庙石雕像“握杯坐椅”的姿态也与突厥石人“手握刀匕”的尚武姿态形成对比，体现了元代统治者有意淡化武力征服，强调文化融合，维护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些考古发现表明，辽金元时期的统治者都致力于通过国家祭祀活动，来表达对和平的追求，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环境。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和平基因的世代传承，也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如何在共存中延续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本文受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实践项目《辽代国家祭祀考古遗存的调查与研究》（编号 SJCX2024065）资助。同时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规划项目“北京地区辽金元时期多元文化互动与交融的考古学研究”（编号 22LSA02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統
应用场景：
博物馆、遗址区、考古发掘现场、图书馆、档案馆、革命纪念馆、旅游景区.....
智慧保护：环境调控、环境监测、本体监测、储藏设施、文物展柜、文物运输监测、文保修复实验室装备.....
智慧管理：藏品管理、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客流监测、数字资源管理.....
智慧服务：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展陈、智慧导览、展柜换气率评测服务、熏蒸消杀服务、咨询服务.....
官方微信 官方网站
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Ltd.
联系人：张总13572270596
座机：029-88346362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
网址：www.microwise-system.com